

及至汽车抵中央饭店门前时，荣亦与我同车至顺承王府官邸，晋谒张副司令后，张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还跑出来了！”我答：“全仗荣参谋长的掩护。”在我晋谒张副司令面陈事件经过时，除荣参谋长在座外，还有副官长何立中和汤国楨等亦在座，我正要向他“报告经过”。他说：“不谈了。”我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他说：“六十多条外交案件，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接着又问：“你有钱用吗？”问毕就写了张条子交给何副官长后，又说：“江桥完了，你回不去了。”又对何立中说：“给予关玉衡参议名义，月支200元。”至此，我即行礼辞出。

次日晨饭毕，我即到行营见何立中副官长，他说：“昨晚的条子是批给你500元钱，一切都给你办好了。你不要住东城。”晚间我即移寓在西单花园饭店内。这几天内学生游行示威的队伍不少，墙壁上张贴的尽是“打倒张学良”和“打倒不抵抗主义者”的标语。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中村事件真相

董昆吾

1931年在东北兴安屯垦区发生的“中村事件”，我是亲身参与的一个人，现将这一事件的实际经过概述于下。

1931年我任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附，团部与所属的第一营同驻兴安区余公府（蒙古王府，在王爷庙北约40华里，居洮索铁路线上）新建营舍内。在那年的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字雁宾，皖人）率领士兵正在团部门前操

场操练，见有4人乘着大马，并驮载行装甚多，由团部西边大路上从北向南奔驰而去。陆以形迹可疑，遂令士兵将该4人追回到操场问话，但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不通，陆疑其为日本人，遂报告于我。时值团长关瑞玘（字玉衡，吉林宁安县人，今属黑龙江，现任该县历史博物馆职员）去外防巡查，未在团部，由我代理团长职务。我到操场以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自称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印“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据称，他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以前方道路不安，据说时常有土匪抢劫，因此将由此折回，仍返回洮南，等语。我看见他的马匹高大，非东北所产；又该一行4人，除去中村震太郎外，还有一个日本军曹（等于中国军队中的中士），一个喂马的白俄，一个带路的蒙古人，而且时当夏季，他们还穿着棉袄棉裤，并都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我遂向他们说明要加以检查，当于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我检阅其笔记、地图，方知中村系在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他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我既经知道中村是日本的军事间谍，遂以“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南”为词，将他们4人扣留。当时的关团长去外防巡查，尚未回团，我即派人向他报告并召他回团。翌日关团长回来，我将扣留中村的经过向他详细报告，并向他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

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当日下午关团长在团部召集全团连长以上的会议。我仍主张我的前述意见,并说明理由,当时在场干部一致通过,无一异议。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4人用绳缚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派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10余人把中村等一行4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然后把他们的骨灰扬散,使无痕迹可寻。他们所带的马匹则用枪击毙后推入团部西边的洮儿河内顺流浮走。他们所带的行装衣服,除保留其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

当时为了避免此事被日寇调查知晓,我们曾想尽方法消灭痕迹。不意洮南日本领事已接到中村已经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并计算预定到达洮南的日期已过二十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遂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线(那时该铁路尚在铺修路基中)向北寻找,及至余公府地方,遂得到该处蒙人告密。中村被扣后,他所带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日方以此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尔后日寇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也曾化装亲到余公府调查,遂得知中村被杀的真相。沈阳日本总领事随即向我东北代理长官荣臻(那时张学良还在北平)提出严重交涉,此时始知中村是日军大尉,是日本的参谋本部所派出的军事间谍,为了准备出兵兴安岭对苏联作战而由东北海拉尔出发,经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的。日本军阀借口“中村事件”激愤嚷叫,摩拳擦掌,遂于9月18日之夜,不待交涉解决,而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北大营,占领沈阳。当时张学良遵奉蒋介石的命令,采取不交涉、不抵抗主义,

不数月而将全部东北大好山河,以及飞机武器等拱手让于日寇。

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我被调任为东北讲武堂(在沈阳东山嘴子)步兵研究班队长。荣臻曾召我询问“中村事件”的经过。我就把这事件的真相向他作了详细报告。荣为应付日寇的严苛要求,将关团长传到沈阳,派宪兵看守于一旅馆中。在“九·一八”的当夜,日寇在沈阳各处搜捕关团长未获。关在旅馆中以钱散给士兵,于当夜脱逃,后到北平^①;我亦化装到平。

同年冬季国际联盟所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时,关于“中村事件”这一部分的材料是我和荣臻商量写的,并绘图加以说明,交给调查团,其内容大意是:“余公府到王爷庙间,时有土匪出没,道路不靖,为了保证中村一行4人的安全,拟派兵护送,故暂留他们于团部中。当日深夜,中村一行4人乘隙逃跑,守兵追赶,中村等以枪射击守兵,守兵还击,当将他们4人击毙。该团干部以中国系一弱国,而日军强横,恐有无理要求,遭受处分,故将尸骨焚化扬散,以图灭迹”,等语。

1936年夏间,有长春天宝堂国药店商人常某往来于长春、上海间贩卖人参,他到沪告我说,屯垦军的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于“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寇,任伪满炮兵团团长,1936年春日寇伪称调他赴新京(长春)受训,将他逮捕。陆供出“中村事件”的详细经过,曾在满洲报上以大字登载。日寇对我和关团长再次悬重赏通缉。陆被日寇处以刖刑,零割肢体,为中村奠祭。日寇并将中村残杀经过编成戏剧、电影,大肆宣传,借此来鼓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仇视中国的情绪。

同年春间日本大使川樾曾为“中村事件”寻访我的踪迹,当时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王家桢(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此事告

^① 关于关玉衡从沈阳脱身的经历,应以关本人的回忆为准。

我,让我注意。我即由那时起把我的原名“平舆”改为“昆吾”。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关于《中村事件真相》的补充

谷振寰

关于《中村事件真相》文中所述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第一营营长陆鸿勋被日人残杀祭灵的经过,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我是在1936年(伪康德3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动思想大检举时离开东北的,与陆鸿勋相识。他在“九·一八”事变后,随兴安屯垦军转移到黑龙江省,参加马占山领导的抗日战争。屯垦军全部编为一个旅,旅长是苑崇谷。马占山退驻海伦,苑与马意见不合,去职进关。该旅长遗缺由炮兵第九团团团长璞炳珊继任,编为黑龙江省暂编第四旅。

陆鸿勋于1933年接受伪满改编,任黑龙江省第三军管区直属炮兵队中校队长,统辖炮兵两个营。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是张文铸,参谋长是于治功。

1934年陆鸿勋因母丧回安徽原籍,数月未归。当时我以为他已归还祖国,不再回沦陷区。但他竟向伪司令官张文铸、参谋长于治功通信续假。等他回任时,见面谈及此事,我颇不以为然。他说:“家中经济困难,不得不回来。”竟贪图伪满军官生活待遇(中校级七级薪220元,办公费250元),这是他自投死路的主要因素。

1935年夏秋之交,中村震太郎的儿子,由日本国内来东北寻找他父亲的骨灰,住于伪黑龙江省第三教导队骑兵第三团团